

超越与回归

何显明 著

毛泽东 的心路历程

学林出版社

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何显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 何显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6

ISBN 7-80668-280-5

I . 超... II . 何... III . 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 A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302 号

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作 者	—— 何显明
责任编辑	—— 曹坚平
封面设计	—— 鲁继德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64844713 传真：64844088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 640×965 1/16
印 张	—— 24.25
字 数	—— 27.5 万
版 次	——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 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668-280-5/A · 2
定 价	—— 28.00 元

前　　言

从文化学的视野,特别是从中西文化冲突、融会的广阔背景中去透视毛泽东个人思想理论的精神特色、文化渊源,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二十年来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这种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换,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曾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但是,严格地讲,对于毛泽东及整个“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学研究,国内学术界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学术差距。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以往的研究成果往往只局限于例证毛泽东怎样广泛地运用传统成语典故、神话故事,引用古代经典,以及如何运用具有鲜明的中国语言风格的表述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于说明毛泽东改造了几对传统哲学范畴,……如此等等。其实,这种文化承继仅仅是表层的。要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文化性格,它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必须深入地探究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审美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思想流派,包括诸子百家的思想,正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士大夫的雅文化与民

前
言

间的俗文化等如何积淀在毛泽东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进而如何从毛泽东毕生的思想和实践中透露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毛泽东现象”纳入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深刻地把握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在精神联系，揭示出“毛泽东现象”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以往也容易受到一种固定模式的限制，即习惯于通过复述毛泽东有关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某些论断，来论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所持有的辩证态度，而未能深入到毛泽东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他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态，从他个人的人格气质、价值理想、道德理念、审美情趣，以及他的喜怒哀乐中去分析他与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这种研究模式一方面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容易将毛泽东研究引入象牙之塔，难以对类似前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热”等现象作出积极的回应。

90年代初出现的那场“毛泽东热”现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深刻启示就是，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的人格魅力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具有惊人的吸引力，毛泽东的文化遗产还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现实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影响。披露毛泽东个人生活情趣和七情六欲的纪实文学一再引起轰动效应，沉寂了几十年的“红太阳颂”一度成为最时髦的流行歌曲。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无意于，也不可能过多、过细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大众，对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求索的欲望。然而，由于这场“毛泽东热”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中夹带的非理性成分，被商业化运作的许多不严肃的出版物进一步放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场“毛泽东热”中，充斥在各种出版物中的是对毛泽东个人神奇魅力过分夸张的渲染，是对奇理斯玛领袖人物非理性的留恋与期待，唯独缺少的是对这样一位人物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

及他的历史地位深刻的理性反思。结果,除了满足了一部分人一时的情感需要以外,这场“毛泽东热”对于民族理性的觉醒并无多大裨益可言。在商业化运作的背景下,刚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几乎又被人们出于新的精神需要请上了新的神坛。

有鉴于 90 年代“毛泽东热”中出现的对毛泽东人格的精神膜拜现象,以及毛泽东的文化心态研究被长期忽视的状况,本书立足于对毛泽东人格世界及其文化根源的剖析,力求全面、客观地把握毛泽东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并对“毛泽东现象”作出理性的反思。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人格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产物,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历程是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历程的人格投影。它以个人“小我”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大我”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中摆脱传统束缚走向新生的精神悲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态是我们今天反思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西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为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文化背景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了毛泽东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文化性格,塑造出了毛泽东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心理期待极为合拍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长期沐浴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之中,也无可避免地给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是毛泽东文化心路历程的基本走向。但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使这一历程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以致于晚年毛泽东在执着地超越一切旧文化时,恰恰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向旧的文化传统复归的倾向。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毛泽东得以成就其辉煌革命业绩的重要依据,但也正是由于

与传统文化存在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的社会文化实践最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本书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及其文化选择对于现代中国变革所具有的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毛泽东在文化变革上所进行的种种创造性尝试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也对晚年毛泽东文化心态同时代精神走向的冲突及其文化根源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种分析不仅无损于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而且正是实现毛泽东由神到人的转变的不可缺少的一环。正如李锐先生所说的:“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蚀,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减损丝毫世人对他的尊敬。人总是复杂的,像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①

对毛泽东人格世界与文化心态的分析研究,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从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存风格,到人格信念,毛泽东精神世界的每一个侧面,都深深地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之流中。毛泽东身上始终保留着一条维系其心灵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之联系的精神脐带。没有毛泽东,我们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会是什么样一种局面;而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是根本无法想象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会诞生这样一位神奇而独特的毛泽东。

注释：

- ① 李锐：《字斟句酌卅年心》，《读书》1991年第2期。

前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 一、关怀与拯救 4
- 二、民本与民主 15
- 三、慈悲为怀,普渡众生 31

第二章 六亿神州尽舜尧

- 一、内圣之道 48
- 二、新民实践 55
- 三、圣贤气象 58
- 四、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 67
- 五、新人与新世界 75
- 六、马克思加秦始皇 83

目
录

第三章 刺破青天锷未残	
一、传统中国的叛逆	96
二、“和尚打伞”	105
三、叛逆者的性格	108
四、造反有理	115
五、翻案与反潮流	123
六、传统与反传统	130
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大气量人	141
二、远大目光	151
三、英雄使命	158
四、烈士风范	169
五、豪杰品性的精神本源	174
六、领袖魅力的社会效应	185
第五章 踏遍青山人未老	
一、一代风骚	197
二、孤独的江海客	206
三、动·变·斗	212
四、诗化政治	224
第六章 风景这边独好	
一、农家本色	239
二、价值的天平	245
三、实践理性	252
四、两难中的抉择	264
五、墨学流韵	277

第七章 暮色苍茫看劲松

一、万类霜天竞自由	296
二、“人有病，天知否？”	310
三、桃花源里可耕田？	315
四、从此天涯孤旅	326
五、上帝请我喝烧酒	338

第八章 残阳如血

一、英雄主义时代及其终结	353
二、毛泽东人格的象征意义	361
三、俱往矣	367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第一章

七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人間正道是滄桑	天若有情天亦老	不可沽名學霸王	宜將剩勇追窮寇	天翻地覆慨而慷	百萬雄師過大江	鐘山風雨起蒼黃	虎踞龍盤今勝昔	萬里東風送暖來
---------	---------	---------	---------	---------	---------	---------	---------	---------

能否在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悲喜无常的人生境地中，始终不渝地坚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是评判一个人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对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坚守，正是其政治气节和操守的体现，是其区别于无廉耻的政客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中，这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即是所谓的“道”。“士志于道”，闻道、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是儒者的天职所在，是儒者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理念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便是要求政治权力（势）的运作必须接受“道”的导引和规范。“道”体现的是一种合理的人间秩序，故在不同的人那里，“道”往往便有截然不同的内涵。于是，“道”有正邪之分，有王霸之别。尽管如此，在正统儒家那里，“道”总是与社会群体利益相关联。换句话说，合乎“道”所规定的人间秩序，必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因而，历史的逻辑必然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理念上来说，“天地间，惟理（道）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也，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

以为存在者也”^①。失“道”，最终必失“势”。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道”却一再遭到“势”的肆意践踏。为此，以守道为职志的志士仁人，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就不能不肩负起“以道易天下”的悲剧性的历史使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与道殉乎人者也。”^②本着这样一种坚毅执着的理想主义信念，古代一些优秀知识分子高扬“民本”旗帜，同昏庸之“势”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历史活剧。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为坚守“民本”之道，不惜以身殉道的光荣传统。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坚守民本之道的精神传统。无论作为一个无道之势的反抗者，还是作为热切探寻“人间正道”的执政者，贯穿毛泽东全部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就是“民为邦本”，或者说“人民就是上帝”。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始终以解除民众的苦难作为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构成了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尽管晚年毛泽东在探寻“人间正道”的实践中也发生了种种失误，但就他在任何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依然始终不渝地追寻和捍卫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人间正道这一价值立场而言，他的确无愧为“士志于道”这一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传统卓越的实践者。

一、关怀与拯救

1920年9月，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破格聘用他的是当时的湖南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易培基。易氏对毛泽东的才学极为赏识，他对这位抱负不凡的青年人的前程

作了最辉煌的描绘，时常对人说：“毛泽东将来要当平民天子。”^③

“平民天子”的期许，是非常独特的。自古以来，“天子”就是“天子”，从来没有什么“平民”的“天子”。历代帝王充其量也不过是运用儒家“天心即民心”之类的理论，标榜自己的政治统治得到“天心”之垂顾，代表“民心”之所向，以此来粉饰其奴役万民的政治本质而已。但落实在毛泽东身上，“平民天子”的期待，又的确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所谓“平民天子”，对于毛泽东来说，其象征意义首先即在于它相当形象和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终其一生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为平民的解放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价值情感与立场。这种价值情感和立场，自然与儒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内在关联。

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洋溢着鲜明的入世精神。尽管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④的念头，历代儒家君子高蹈远举者亦比比皆是。但是，真正的儒者，他的眼光必定是投注于眼前的世俗世界的。面对“礼乐崩坏”、王道湮没、霸道横行的残酷现实，他们既不能像杨朱之流那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把对人生无常的忧患与焦虑完全转化为对肉体享乐和世俗利害的关注；更不会像庄子一样，彻底忘怀于人世间的一切，以窒息对世俗世界的价值关怀来完成对生命意义的觉醒。儒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儒者的个人命运、生命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同情、怜悯不同社会阶层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并将拯救这种苦难视为儒者的天职。当道家将拯救苦难视为徒劳无益和极不明智的妄举，袖手冷眼作壁上观时，儒者却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悲剧。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从诸

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代不乏人的无数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

从小就对“穷人”、“饥民”的悲惨遭遇寄予无限同情的毛泽东，在韶山冲阅读抱打不平、劫富济贫的造反故事，阅读儒家经典以及时人所著的一些救亡小册时，心中就已朦胧地升腾起一种拯民救世的英雄主义冲动，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实使命感。离开韶山后数年间对传统典籍刻苦、系统的研习，以及“以贤圣为祈向”的人生追求，进而又将毛泽东朦胧的拯救意识升华为鲜明、强烈的思想性格和价值情怀，并将他的拯救冲动纳入了儒家正统的思想轨道，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伟大的精神品性。

“关怀——拯救”意识在胸间的萦绕，从根本上铸定了毛泽东异常执着的“入世”精神品性。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自觉地将个人的生存价值同民族命运的改变和人民苦难的拯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唯有尘世间功、德、言“三不朽”的浩浩功业，而不是乃父式的发家致富，抑或松风明月、闲云野鹤式的隐逸生活，才能真正满足他强烈的拯救冲动，才是他的人生志趣之所在。对于毛泽东来说，置身近现代中国这个充满了混乱、灾难、耻辱的历史舞台，“出世”的选择根本就是难以想象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对国人颓唐厌世、抵抗力丧失殆尽的消极心态的猛烈抨击，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共鸣：

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其始也未尝无推倒一时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此四者，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